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散文家



顾易生主编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散文家



顾易生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散文家

顾易生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125 插页 5 字数 112,000

1990 年 7 月第 1 版 199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500

ISBN 7-5325-0770-X

I·458 定价: 2.75 元

前 言

中国古代散文是一个伟大灿烂的存在。“江山代有才人出”，三千年的散文发展史上，作者如繁星丽天，要选择十位大家作为代表颇非易事。再加中国古代散文的形式非常丰富多采，不仅有近代观念所说的各体文艺散文，还有大量关于哲学、政治、历史等著作以及应用文字，也富有文学价值；而许多古代散文作家又那么多才多艺，散文之外或兼擅辞赋诗词等创作，文学之外或兼通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科。本书是“十大系列丛刊”之一，须要兼顾左邻右舍，于是有的散文大家不得不割爱而情让给他书，有的名字则又难免与他书重出叠现。因之，我们力图在本书中列举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上若干大家，他们在各自时代的散文领域中作出过贡献，不敢说所举者都是最有

代表性的，更不敢夸称这里已囊括了古代主要散文大家。限于学识，选择或有未能尽惬人意，敬希读者谅解。

远在先秦时期，我国散文已有高度成就。它是从实用文字和学术论著发展起来的。其时产生的典籍如《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著作都很有艺术特色。韩愈《进学解》称说过“《左氏》浮夸”，鲁迅更赞美《庄子》之文为“仪态万方”（《汉文学史纲》）。如果《左传》、《国语》确如传为左丘明所作，他和庄周均无愧为第一流散文大家，其文采风流沾溉后代无数作者。不过《左》、《国》之书，毕竟隶于经、史之部，庄周则是《中国十大思想家》中重要成员。本书中未列先秦时期作者，并非抹煞他们的历史地位。

战国末期至秦汉，散文领域陆续出现了如书、论、记、序、碑志等体单篇文章，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文学地位。柳宗元《西汉文类序》说：“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壮丽”是个美学范畴，概括了西汉文章的迈越前古与雄视后世的风格气派。贾谊是汉代文坛上开风气的人物，同时又是大政治家，然其政见未能实施而表现于文章。他的政论，文情并茂，气势磅礴，自成结构，允称“西汉鸿文”（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司马迁《史记》把

他和战国大文学家屈原同传,《昭明文选》不录经、子、史传而“论”类首载贾谊《过秦》,所以本书请他在十大散文家行列中第一个出场。司马迁的《史记》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同上),被历代公推为古典散文的伟大典范。只奈《中国十大历史学家》更有权请这位太史公为其主角,本书也就避免重复了。

辞赋骈文是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特殊产品,视其韵散、骈散结合的不同程度,有的可置于散文之大范围中,有的则与散文相对立。辞赋起源于战国,大盛于汉代。骈文(包括骈俪化的辞赋)萌芽于东汉,流行于南北朝。魏曹丕《典论·论文》明确揭橥“诗赋欲丽”,近代论者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到来的标志。“丽”是美丽的意思,也涵有俪偶之义。这等于说诗赋骈文是美文。应该肯定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统治文坛的是辞赋骈文,散文虽不乏传世的作者与佳作,而代表时代的大文豪如庾信,其“健笔凌云”(见杜甫《戏为六绝句》)所作多属骈体辞赋。

骈偶与声律是根据汉语特点总结出来的艺术规律,但一种美的形式凝固化而长期垄断文坛,致使“芜音累句”泛滥成灾。唐代韩愈、柳宗元等振臂高呼掀起散文复兴运动,北宋欧阳修、苏轼等继之,取得了散文在文坛上决定性胜利。韩、

柳、欧、苏等的散文，号称“古文”。他们在广泛继承先秦西汉散文优秀遗产同时，借鉴诗赋骈文的丰富艺术经验，吸取民间新鲜语言，更注重自己的创造。他们还扩大散文的领域，不仅发展秦汉以来已有的散文体裁，踵事增华，还用散笔去写作过去由诗赋骈文抒写描绘的题材，创作了许多诸如杂说、传记、游记、寓言等叙事、抒情、言志的文艺散文。他们也创作辞赋，有的更加散文化而被称为“文赋”，可算是移植于散文园地的奇葩。因此唐宋散文实为一种新型散文，在文学史上出现又一次散文的高潮。明代批评家们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并称为“唐宋八大家”。本书十大家之中有五位选自上述八家，也好算是遵从约定俗成吧！至于唐代传奇文自是一代之绝，但当归诸小说范围了。

元末明初文坛领袖宋濂、刘基、方孝孺都是宗法唐宋诸家的。明代中叶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前、后七子高举“文必秦汉”的大旗，冲击平庸萎弱的台阁体和宋儒的语录体，确实起了摧枯拉朽的历史作用，也产生了模拟剽窃的严重流弊。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继承和发展宋濂等的观点支撑其间，提倡取径唐宋而学习《史记》的神理，世称唐宋派。其一时声势

未能与秦汉派抗衡，也未离复古窠臼。不过他们所宗奉的唐宋之文毕竟比秦汉文的时代距离为近，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也好算是某种进步，他们在复古与新变之间持论比较折中，容易为人们接受。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得到广大读者的传诵和归有光文的被“议者”以为“明文第一”（见黄宗羲《明文案序》），不是偶然的。明末清初一些重要批评家与作家如艾南英、钱谦益、黄宗羲、侯方域、魏禧，以至清代前中期散文主要流派桐城派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倾向或继承了唐宋派的观点。桐城主将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其中八家文占很大比重，而于明代则选了归有光文。姚鼐论“学问之事”，兼重义理、考据、辞章。他于前两者实无多少造诣，因受清代一些经、史学家讥议，但其辞章之学，却可说是集明代唐宋派与清桐城派方苞、刘大櫆等论艺的大成，故一时被奉为文宗。“桐城谬种”之受到近人批判，主要当是其末学之咎，章太炎《与友人论文书》中还郑重声明“未尝薄姚鼐”。至于晚明袁宏道的小品文，晚清梁启超的新文体，都是异军突起，开一代新风，从内容到形式冲破了传统古文的束缚，尽管旧时曾为某些正统文家所诋呵，而现代散文研究者则几乎一致肯定他们的突出贡献与成就。本书于明清散文家兼收并列了归、袁与姚、梁，庶几

“百花齐放”之旨。

在中国传统文坛上，散文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作家作品美不胜收。然而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其注意却不及古典诗歌、戏曲、小说。这方面的研究、评介工作也做得不够。所幸本书诸篇的撰作者，除本人忝附骥尾外，多为蜚声海内外名家，也有近年成绩卓著的中、青年学者。约撰诸题，又都属他们的业务专长，故所作显得那么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不拘一格，深入浅出，于行云流水之中反映长期钻研积累的独到见解。相信读者定能从中获得丰富知识与审美享受，提高精神文明修养。谨在此向诸位撰作者表示深切的谢意。其国内诸专家，谅为读者熟知，毋待费辞介绍。《姚鼐》作者佐藤一郎先生系日本庆应大学文学部主任教授，彼邦中国文章学权威；该文译者和《归有光》作者吴鸿春先生系日本日中学院专任讲师兼中央大学讲师，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多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附此特为说明。

顾易生

一九八九年八月

目 录

	前 言.....	顾易生
1	贾 谊.....	邵毅平
23	韩 愈.....	蒋 凡
47	柳宗元.....	顾易生 顾宁
66	欧阳修.....	陈尚君
88	王安石.....	王水照
106	苏 轼.....	何满子
127	归有光.....	吴鸿春
154	袁宏道.....	钱伯城
179	姚 鼐.....	佐藤一郎
202	梁启超.....	黄 霖

贾 谊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著名绝句《贾生》，其中所歌咏的主人公，便是西汉初期著名政治家和散文家贾谊。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兼为政治家或军事家或哲学家的文学家，他们的功业因其文学而播于人口，他们的文学因其功业而愈受重视。贾谊便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功业，影响汉初政治甚巨；他的文章，也深受历代文人喜爱。而在散文的各种体裁中，贾谊是最早从事政治与文学相结合的政论文写作的先驱之一，这种散文文体，又予后来的散文发展以深远影响。贾谊的政论文不仅具有较高的政治价值，而且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上引李商隐绝句中

所说的“贾生才调”，即兼有政治与文学两方面的含义。

贾谊，西汉洛阳人，生于汉高祖七年（前200）。他所处的时代与他所受的教育，注定了他将成为一个为大一统王朝服务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游说于诸侯之门的纵横家。他年仅十八岁，便以能诵《诗》《书》、善写文章而闻名郡中。《诗》、《书》是儒家的经典，曾是秦始皇“焚书”的对象，其中的儒家学说，对贾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章是贾谊后来表达政见的工具，也是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留名的东西，而他在少年时代便已经很擅长了。当时的河南守吴公，对他非常赏识，因而罗致门下。吴公是李斯的同乡兼学生，对于李斯的学说非常熟悉。李斯是荀况的学生，后成为法家代表人物，曾协助秦始皇统一中国。李斯的思想 and 谋略，也当通过吴公而对贾谊发生深刻的影响吧！贾谊二十一岁时，从荀况的学生张苍受《左氏传》，使他一方面得以更加熟悉儒家的政治学说，另一方面得以考察前代的治乱兴亡，这对于他那历史感和历史眼光的形成，也有重要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李斯还是荀况，都是通晓“帝王之术”的人。贾谊之所以没有像汉代前期的某些文人那样游于诸侯之门，乃是因为他的政治抱负要大得多。他在历史文化名城洛阳磨炼着自己的才

能，砥砺着自己的学问，等待着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

命运没有辜负贾谊的才能和努力。就在他二十一岁那一年，也就是汉高后八年（前180），汉朝宫廷里发生了一件无论是对汉王朝还是对贾谊都有重要影响的事件，那就是危害刘氏政权的诸吕外戚集团的灭亡与文帝的登基。翌年，汉文帝召吴公入朝，吴公向他推荐了贾谊，汉文帝便召贾谊为博士。这是贾谊登上汉初政治舞台之始，此时他才二十二岁，在博士当中，贾谊的年纪是最轻的，但才能却是最高。每当诏令下来，那些老先生们还来不及作出反应，贾谊便已经对答如流了。贾谊的才能，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一年之内，便升任太中大夫。太中大夫是一个无实事而备顾问的职位，相当于皇帝的高级顾问。汉初陆贾就曾担任此职，为汉高祖出谋画策，立下了汗马功劳。汉文帝让贾谊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表明他对这位比自己还要年青的学者与才子的倚重。

贾谊年纪轻轻便接近了最高权力中心，这不能不使他踌躇满志。他渴望像历史上那些著名辅相那样，协助汉文帝完成不朽的伟业，自己也藉以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名声。于是，他开始接二连三向汉文帝上书，对各种政治问题直率地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看法。在经历了秦汉之交的暴

风雨般的动荡之后，汉初统治者都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作为自己的治政指南，一切以简易为原则，还顾不上种种繁文缛节。因此，从汉王朝建立至贾谊时，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统治日趋巩固，经济日趋富强，社会日趋安定，而与封建大一统国家相称的文化制度却尚未建立。于是，贾谊就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一整套方案，想要促使文帝完成这一任务。《史记》本传说：“贾谊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所谓正朔、服色、官名、礼乐等等，在中国历史上都曾被视作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大事。不过，汉文帝的想法却和贾谊不同，他还是继承了父辈的传统，一切以简易为主，对于贾谊的提案，他“谦让未遑”，觉得自己还不具备这种资格，所以没有采纳。这对想要在建立文化制度方面大显身手的贾谊来说，自然是一个大的失望。后来，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制度方面的措施，其先声则实自贾谊发之。当然，在其他国家大事方面，贾谊还是颇受文帝倚重的，“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史记》本传）。

除了提议建立文化制度外，贾谊还继承陆贾、贾山以来的传统，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为巩

固汉王朝献计献策。为此，他写了著名的《过秦论》三篇，成了史论的开创者。中国是一个史学传统非常发达的国家，而在各派学说中，儒学又是最重视历史传统的。儒家的五部经典中，有两部是有关历史的著作，那就是《尚书》和《春秋》。如上所述，贾谊年轻时就熟读《诗》、《书》，《书》就是《尚书》。后来，他又跟张苍学习《左传》，而据清代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他又曾作《春秋左氏传训诂》。由此可见，贾谊所接受的教育和所从事的学问，相当一部分是和历史有关的，这对于他的历史意识的形成和强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与此同时，贾谊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变化急剧的时代。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历史正由诸侯割据向中央集权发展。但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在贾谊时代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秦王朝在实现统一方面初次取得了成功，但在维持统一方面却陷于全面失败。所以，对新生的汉王朝来说，总结秦王朝的经验教训，意义至为重大。像贾谊这样一个具有史学素养和历史意识的政治家，当然不会忽视这一重大问题。他在《过秦》上、中、下三篇中，首先回顾了秦国的历史，然后叙述了秦王朝的建立，最后叙述了秦王朝的灭亡。贾谊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六国比秦强大，却被秦国兼并？为

何陈胜吴广起义军力量远不及六国，却把秦王朝推翻了？他认为，秦王朝的统一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所以能够兼并六国；但是，秦王朝建立以后，却不懂得“攻”和“守”是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的，还是以原来的那一套治理国家，所以管不好国家。贾谊的潜台词是：现在汉王朝的建立，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但是，如果要免蹈秦王朝的覆辙，就一定要施行“仁政”。这使我们想起了汉初陆贾的话，他曾责问不喜诗书的汉高祖是否在“以马上取天下”之后，还想“以马上治之”？贾谊的意见和陆贾是一样的；《过秦》三篇的主要观点，也和陆贾《新论》的主旨接近。由此可见，回顾秦王朝兴衰的历史教训，探讨汉王朝统治的大计方针，是汉初政治家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后来，司马迁作《史记·陈涉世家》，以《过秦》(上)为赞语；作《史记·秦始皇本纪》，以《过秦》(下)为赞语，并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表明了他对于贾谊观点的完全赞同。这也说明贾谊的观点在汉初是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至于后来东汉明帝以《过秦》(中)“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的观点责备贾谊与司马迁，那是汉王朝统治稳固以后的现成大话，只能说明统治者的虚伪矫饰，丝毫无助于理解政权建立伊始的政治家们的苦心。

在经济方面，贾谊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蓄积”是安定天下、巩固统治的必要条件，而当时却几乎没有什么蓄积，生产的人少而消费的人多，一旦碰到战争或灾害，便会酿成大乱。他说：“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无蓄》），认为只有让人民吃饱了才能维持统治，这是《管子》“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的一个发展。据《汉书·食货志》说，“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后来，晁错也继承贾谊的思想，上疏劝文帝“贵粟”，文帝因此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文景之治”的形成，不能不说也有贾谊的一份贡献。

上述贾谊的这些看法，在当时是属于最深刻、最有远见的，后来大都为文帝及景帝乃至武帝所采纳。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便能够提出如此成熟的政治见解，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汉文帝开始考虑让贾谊出任公卿之职，只不过是贾谊入朝以后两、三年间的事。在二十二、三岁时，贾谊就令人羡慕地步入了人生的巅峰时期。

但是，沉重的打击猝然落到贾谊的头上。等待他的，并不是什么公卿之职，而是一道长沙王太傅的委任令。长沙国远在偏僻而潮湿的南方，远离最高权力中心。到那里去任职，意味着贾谊